

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黄秀兰

摘 要: 一门学科是否成熟与其方法论的完善与否有着直接的关联,研究方法和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门学科能够研究什么和不能够研究什么,决定了学科的视野与深度。政治学方法论在现代政治学或政治科学范式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可以说,政治学方法论的产生与发展直接影响着政治学朝向科学革命之途前进。政治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正是由于方法上的不断革新与突破,才使政治学研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本文回顾政治学方法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简要介绍了其主要内容,评述该学科在近二、三十年的新发展,并展望它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西方;政治学方法论;学科分化;分支学科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1569(2004)02 - 0025 - 08

一、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形成与发展

政治学方法论是专门发展并提供政治研究及政治分析方法、手段、技术或工具的政治学分支领域。政治学方法作为研究政治的一种思维方式,虽然随着古典政治学的产生而产生了,但自觉对其进行系统和科学的研究,使政治学方法论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则是在近现代。政治学方法论的形成,与社会政治实践的挑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革命的冲击以及政治学理论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首先,社会政治实践的发展促使政治学研究者寻求新的途径和理论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趋于复杂,政治学家试图解释各种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以解决和缓和现实社会的各种矛盾与危机。但传统政治学所采取的关注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机构的制度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无法为他们提供满意的答案,因此他们迫切要求进行方法上的革新。

第二,行为主义的兴起使政治学对方法问题的探索成为自觉。传统政治学未把方法论当作问题,即对方法问题并不是自觉的。“行为主义革命”之后产生的现代政治学以自然科学为榜样,力求使政治研究成为一门探索普遍规律的经验科学。因此,它对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有着自觉的要求,尤其是它试图将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技术引入政治研究,使政治研究科学化。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各国政治学者围绕着方法论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此间不仅出版了许多专门论述政治学方法论的著作,如格奥尔格·布尔丁的《政治学的方法》

基金项目:“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励计划”项目(2001)。

作者简介:黄秀兰,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

(巴黎,1959 年),M·杜威格的《政治学方法论》(巴黎,1959 年)和 A·布雷希特的《政治理论》(普林斯顿,1959 年)等等,而且还从政治学同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方面探讨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问题。

第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蓬勃发展,以及各学科的学者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使政治学得以借鉴和引入其他学科的方法。二战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出现了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这三个划时代的一般科学方法论。它们首先进入了政治学领域,并在政治学领域卷起一股全面革新之风。从伊斯顿的系统论到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从卡普兰的国际系统论到多伊奇的沟通理论,无不与“三论”有着直接的关联。此外,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理学、生态学、数学等领域出现的最新成果均被借用到政治学研究中来。例如,国民经济领域中“演绎的典型方法”就被运用于政治学的研究;曾经广泛运用于哲学研究的语言分析方法,也被一些学者运用于政治学基本概念和定义的研究;拉波波特作为一个在数学和博弈论方面公认的专家,也专门撰写了政治学方面的文章,并把数学和博弈论中的数理逻辑方法运用于政治学研究;1964 年出版的 M·舒比克斯的论文集《策略理论与研究社会行为的方法》以及 1965 年出版的德文本著作《博弈论与社会科学》,可以算是数学方法运用于政治学研究的代表作。

各种方法的引入,不仅展拓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产生了许多新的边缘学科,而且使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并最终形成了当代政治学的科学研究方法体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西方政治学方法论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和分支已逐渐走向成熟,并出现了一批颇具影响的著作,如:《政治分析的理论与方法》(米汉),《政治学的视野与方法》(艾萨克),《政治学研究方法举隅》(奇斯克),《实证的政治分析——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米汉和瑞奇)等。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传统时期、行为主义与后行为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传统政治学主要采用历史的研究法、法律的研究法和制度的研究法,绝大多数政治学家的注意力集中在政府机构、国际组织、联邦制和分权等问题上,主要依据官方文件或经济统计数据来进行研究。尽管这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却将原该属于政治学的一大片研究领域排除在外。50 年代的“行为主义革命”使政治研究的重点发生了转移,行为主义对当代政治学的影响极为深远,“若不能了解行为主义的研究走向、研究途径及研究方法,则无法掌握当代政治科学的内涵”。行为研究法推崇科学的手段与方法,主张运用实证的研究方式,进行具体的政治研究。所谓的科学与实证,即广泛采用数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政治活动与政治现象进行“价值祛除”(价值中立)的实证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所谓具体的政治研究,即关心的是政治行为者的行为而非制度,分析的单位是政治行为者而非机构,从而将选民、利益集团、政党、投票行为和政治社会化等课题纳入他们的研究范围。60 年代以后,后行为主义学者对行为主义进行了批评,他们试图采取一种中间的立场:虽然他们偏爱使用经验的研究方法,但也相当注意自己研究成果中的价值关系。

二、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政治学方法论是与政治学研究的“过程和假设有关的知识和技术体系”。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分析途径,又称“理论”(theory),指的是研究政治现象所遵循的通则,即选择研究问

题、研究资料和研究角度的准则,它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一定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二是研究技术,是指收集并分析有关政治现象的材料所使用的特殊手段,诸如调查研究、内容分析和统计学等。

(一) 分析途径

政治分析的理论模式大部分是经过“行为主义革命”之后提出的。现代政治分析的理论模式可谓“百家争鸣”,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种形式的理论,而不同的学者又有不同的分类。德国著名政治学家K·V·柏伊姆在《当代政治理论》一书中将各种分析模式概括为五类:历史—发生学的方法论、制度的方法论、行为主义的方法论、功能—结构的方法论、比较的方法论。美国学者艾萨克在《政治学的视野与方法》一书中则将之分为学习理论、决策理论、集团理论、精英理论、系统论与功能分析、沟通理论等。就建构方式即学科来源而言,有心理学的途径、社会学的途径、人类学等学科途径等等。就分析单位而言,又可分为宏观的研究与微观的研究:前者以整个政治系统为解释的对象,如系统论与功能分析、民主的理论、政治发展理论等;后者以个人或次级系统为解释对象,如集团理论、精英理论、决策理论、组织理论等。下面我们仅简要介绍几种影响较大的分析模式。

1. 系统理论

系统理论是二战后政治学界影响最大的研究途径之一。一般系统论最早产生于生物学研究,后被用于社会科学研究。60年代,美国政治学者伊斯顿创立了作为政治学方法论的系统理论,其后阿尔蒙德、卡普兰等人又对其进行了发展。系统理论自其产生以来就成为政治学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现已成为政治科学中的重要范例之一。它把政治现象看成是一个既有层次分工而又系统完整的有机整体,同时它又是一个动态开放的政治系统,为其他社会系统所包围,并对外界环境的变化做出反映,着重分析系统内部与外部的动态平衡和自我维持。

2. 结构—功能分析

结构—功能分析开始是作为系统分析的一个学派而出现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阿尔蒙德。结构—功能理论以系统的存在为前提,广义上也可把它归为系统理论的一种形式,指的是运用系统论关于结构和功能的相互关系的原理来分析政治现象的方法。结构指的是政治角色的某种组合,功能指的结构活动的后果和影响。结构—功能理论以政治结构为分析起点,通过研究结构及结构如何履行某些必要的功能以促进系统的维持来考察分析政治系统的运行状况和规律。

3. 集团途径

集团理论(或团体理论)是以政治利益集团的行为为分析中心,通过研究政治利益集团的性质和互动来考察分析政治现象的一种研究途径。在政治学史上,集团理论最先向传统政治制度研究提出挑战,它注重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促进了政治学从规范研究转到实证分析上来。集团途径关注的焦点是集体,而非个人,因为它认为集团比个人在政治过程的形成上更有影响力。在集团理论看来,集团利益对政治过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政治的过程就是集团互动的过程,政治系统的变迁就是集团形态改变的结果,政治最终只能通过分析社会中不同集团间的相互关系方能得到解释。

4. 精英途径

精英理论是通过分析统治者和杰出人物的性格及其政治统治行为来考察分析政治现象的一种研究途径。精英理论以一切政治系统都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个阶层为假定前提,统治者叫做政治精英,他们支配着政治权力,在政治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决定着政治的性质和社会的变迁。

因此,政治研究只有以政治精英为注意的中心,才能把握政治的本质。精英途径是一种微观的研究方法,是对制度研究和集团理论的一种反动。尽管精英理论显然夸大了精英的作用而有失片面,但它对研究权力较集中的系统如集权政治系统很有价值,因为在这些社会中,精英的影响力几乎是决定性的。

5. 决策理论

政治决策分析作为一种政治分析的方法是在 50 年代发展起来的,它盛行于 60 年代和 70 年代。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这一方法的发展极为迅速,并由此而产生了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决策在当代几乎已成了社会科学中最热门的课题。决策理论将决策活动看作是政治活动的核心,是所有政治行为的源泉和结果。因此,它认为政治分析必须从决策分析开始,着重分析政治决策的性质和过程,并试图建立一种决策分析的普遍性理论框架。

6. 沟通理论

政治沟通理论与政治结构功能分析一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并盛行起来的系统科学的产物,其渊源也是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这种方法把政治信息当作政治分析的起点,并把政治沟通作为政治分析的核心,力图揭示了政治系统的信息运行机制。

应当指出关于政治分析途径的分类并不是绝对的,它们有诸多交叉重叠之处,而各种不同的理论也仅仅是分析政治现象的一个或几个角度,因此不同的途径有其各自的适用范围和局限。在现实的政治分析中,学者往往根据不同的研究课题选择不同的分析模式,更多的时候是几种模式同时使用。

(二) 研究技术

政治分析的理论模式为研究提供整体上的框架,是研究工作得以进行的基础,但在进行具体研究时,则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采用一些技术和工具。奇斯克在《政治学研究方法举隅》一书中,对政治学的研究技术进行了详尽的讨论。他将研究程序分为四个主要阶段:(1) 研究课题的系统化;(2) 研究计划及进行研究的工具的发展;(3) 资料的收集、记录及处理;(4) 结果的分析及阐释。米汉和瑞奇在《实证的政治分析——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一书中则将研究程序分为六个阶段:(1) 理论的规划;(2) 使理论可操作化;(3) 选择适当的研究工具;(4) 分析资料;(6) 阐释结果。当然,这些阶段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它们的边界也很模糊。与这些过程相关的分析技术主要有:对集合资料的分析、调查研究法、历史心理学法、小群体研究法、实验和模拟法、隐蔽研究法、统计学的方法等等。

集合资料分析与调查研究。这两种方法经常是被结合起来使用。对集合资料的分析也就是对包括人口统计材料、财政收支报告、投票结果报告等的分析,这一分析方法处于绝大多数政治研究的核心地位。这些资料的来源很广,比较容易获得。调查研究法是行为主义学派最为重要的方法,有人称这种方法对战后政治学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调查研究是通过访问和问卷的手段调查社会政治现象,其目的是研究人们的态度、舆论、行为和社会属性等等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调查研究一般采用统计学的手段对一类现象或人进行大型的抽样调查,并由接受调查的样本得出普遍的推理。

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政治科学中运用最普遍的个案研究(或案例分析)是历史研究方式用于当代世界的一个变种。它是指为揭开一种特殊的政治事件或现象的详细信息而进行的研究。与运用比较研究或运用调查研究对许多案例进行抽样的研究不同,个案研究处理的是一个单独的案例

或事件。在政治科学中,把比较当作一种分析方式和这门学科一样古老。它指确定两个或多个分析单位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的研究方式。任何一个政治事件或案例都可以与其他相似的案例进行比较,也可以与假说的案例进行比较,还可以与连续时间里发生的案例进行比较。

定量分析技术。自行为主义革命以来,定量分析方法在西方政治学中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它是政治学成为“科学”的重要标志之一。行为主义主张对研究资料进行严格的定量分析,力求使政治学能在经过精确计算的基础上解释和说明其研究对象。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大量来自统计学、数学、运筹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定量分析手段进入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并成为政治研究的一种主要方法。

三、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新近发展

近二三十年来,随着自然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对方法论的日益关注,使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政治学新手册》一书中对政治学方法论的新近发展作了简略的回顾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1. 经济学的分析途径

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自其诞生以来就具有跨学科的特征,它大量引入并借鉴了各个学科的卓有成效的方法和工具。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政治学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引入了经济学的分析途径,形成了著名的公共选择理论与新制度理论,而在此前,政治学的方法更多的受到了社会学的影响。

经济学途径对政治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它的分析工具,如结构均衡评估、时间序列分析、非线性模型等(这些工具近来为政治学者广泛使用),更重要的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基础,也就是分析单位的“个人主义”。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治学将集体倾向的行动作为人性之构成和实践的一部分,个人在政治过程或集体行动中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个人被视为不过是有机整体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存在着集体目的、集体选择和集体行动,因此分析的逻辑起点主要是群体而非个人。经济学的研究途径则利用个人不同效用的微积分技术对政治行为进行研究,如公共选择理论将集体和集体活动看成是由个人和个人行动构成的,只有个人在选择与行动,而集体既不选择也不行动,虽然在选择与行动时借助于特定的集体组织结构而产生了无意的总体结果,但这一结果仍是由个人承担。在采用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同时也接受了“理性人”的前提假设,而个人作为理性人追求的是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在此基础上政治活动被视为是一个同市场相类似的交换过程,关注于研究个人是如何加总形成“公共意志”。

政治学研究的分析单位从一级系统(如国家)到次级系统(如政党、利益集团)再转而至微观的个体,恰恰反映了研究者对于政治现象之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入。一级系统及次级系统的研究对于理解政治现象虽大有裨益,但惟有从微观的个体入手才最接触到政治的本质。在此意义上,经济学途径不失为政治学方法论的一种革新。

2. 定性分析方法

二战以来,定量分析方法一直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主流,定性研究被认为有违“科学”精神而倍受冷落。后行为主义的兴起对于价值的肯定使定性研究又重新得到重视,八、九十年代定性的政治

学研究尤其是宏观政治学领域中的定性比较分析所取得的成就,恰恰证明其“有助于建立案例的系统知识并推进理论的发展”。

除了受后行为主义的影响外,定性分析方法的重新兴起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定性方法的使用对理论尚不发达、概念亦很模糊的研究具有极大的益处。因此,定性调查经常是发展新理论的前奏。这是因为定性研究有其自身的优点,它可以采用解释性的语言,而不象定量研究那样要求精确、严密的描述,因而既适合于理论概念,又适合于经验范畴。第二,政治学研究中有许多问题无法用传统的定量方法解决。例如,与重要的历史或文化现象有关的多数问题都是属于经验范畴的。它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限制性,因而只包含有限的,通常是为数极少的案例。定量方法的要求和假设就很难迎合这种案例比较少少的情况。此外,这些研究问题也可能会与定量方法的其他要求相冲突,比如观测对象的精确数,抽样的可能性等等。因此,近来许多研究者们选择了定性的方法,而不是改变他们的研究问题去适应传统定量方法的要求。

定性分析方法在宏观政治学领域的比较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取得的成就也最为丰富,并且发展出了“迥异系统”(MDSO)与“相似系统”(MSDO)设计,定性比较分析(QCA)这样一些技术。这与宏观政治学所面临的两难困境不无关系,这一领域中可供研究的案例很少,而这少量的案例又表现出不可思议的复杂性。定性分析方法正有助于解决“案例少,变量多”的情况。

3. 研究设计与实验方法

由于政治科学对方法论的日益关注,所以它越来越强调研究必须有一个良好的设计。研究设计指的是“用以引导资料的搜集、分析和阐释过程的全盘计划”,详细说明研究者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一项研究设计通常包括:研究问题的陈述(提出要研究的问题或待检验的假设),重要概念的操作定义(至少是一些假设中变量的定义),资料的种类和来源及搜集方法,回答问题或检验假设时分析资料的方法。用来检验假设的设计可以是追溯既往的,也可以是实验的。近来,实验方法占据了日益显著的地位。

70 年代中期以前,实验方法就为政治学研究所采用,但运用的范围并不广,主要局限于政治心理学与政策评估等重要领域的研究,而且采用试验方法的研究者常常被迫为他们对这一方法的选择进行辩护,因此实验取得的成就是很有限的。布罗迪(Brody)和布朗士登(Brownstein)于 1975 年在《政治学手册》中关于实验的撰文引起了有关政治学实验方法的第一次重要而广泛的讨论,他们在文中呼吁政治学研究应更广泛地运用实验原理。在随后的 20 年中,政治科学家们响应了这一号召,此后实验蓬勃发展,在政治学中的影响大大增加并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如今实验方法显然正为越来越多“主流”政治学研究者所接受,这显示了实验日益增强的合法地位。在 1993 年《学科现状》一书中,关于规范理性选择理论的章节,关于政治学方法论的章节,关于公共意志的章节以及政治沟通的篇章都积极而热烈地讨论了关于实验对政治学主要领域和学科的贡献。

实验被广泛运用在于它的两个基本特征,也是它的优点:第一,在结构上,实验是可以控制的,有学者将其描述为“事先精心设计的行为”。尽管实验的定义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将它们与其他形式的科学研究区别开来,那就是研究者观察创造了必需的条件,而不是被动地观察自然发生的条件。第二,在功能上,实验能够有针对性地检验因果假设,验证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正是研究者的主要目的之一。

今天,实验方法的应用领域已大大拓展,并且在公共意志、决策与信息加工、集体行动、规范理

论与公共选择、公共政策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正如迈克格罗(Kathleen M. McGraw)所言:“政治科学实验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一图景是丰富多彩的,工作新颖而成熟。最重要的是,实验已经产生,或者说它对学科所关注之问题的至关重要的知识本身做出了贡献。”

四、政治学方法论的未来

1. 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尽管政治科学研究处于繁荣中,但是许多政治学方法论学者正在经受来自外界的诸多批评。这主要是因为政治学方法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他学科研究方法与技术的运用,它缺乏内生的或自创的东西,因而有批评者认为政治学方法论是“低层次性”的或“虚假性”的。一些学者对此批评感到不安。

不可否认,跨学科的“借用”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政治学所借用的许多方法是为解决其他学科自身的重要问题而发展起来的,而政治学又有着有别于其他学科的“复杂”特性,“借用”之方法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比如来自统计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它无法解决政治研究中属于经验范畴的问题(如消除腐败,社会公平);再比如系统途径的研究,它无法解释系统崩溃的问题(如苏联解体),因为在系统论者看来,系统是不会崩溃的。在实际的运用中又的确存在“全盘照搬”的情况,比如现在广为流行的经济学途径就表现出这一倾向,而“政治人”与“经济人”的区别是不应当被忽视的。

但更为重要的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政治科学带来了繁荣。至少有两条理由可以作为对“低层次性”或“虚假性”这一批评的反驳:第一,许多方法的借用是成功的,诸多学者对这些方法进行了合理的改造并不断发展之,使它们适用于政治学研究。奥尔森、乔治、哈贝马斯、拉斯韦尔、伊斯顿、阿尔蒙德和西蒙等等都是政治学方法论领域的方法创新者。第二,学科合法化应建立在任何学科或所有其他学科发现的基础上,这对于科学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从亚里士多德到韦伯,政治学的研究不断融入来自其他学科的方法,使人类对于政治现象及其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入。如果旧的方法被证明已不适用,那就应当而且必须对其进行革新。政治科学家,就像其他方法论子学科的先哲那样有权从其他学科中寻找任何对解决实际及理论问题有所帮助的东西。

2. 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并重

事实与价值,或“是”和“应该”的问题,从来就是政治学研究争论的中心。传统政治学关注的是价值分析,即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因而进行的是规范研究;行为主义则注重事实分析,即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属于实证研究。在行为主义者看来,规范命题所陈述的价值判断与“科学”无关,因为它无法用经验证据来证明或推翻,因此要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祛除价值的因素,保持价值中立。尽管实证主义研究对政治科学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实证模式在方法论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首先,政治学应该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实践者提供理解社会政治现象的钥匙,而不是简单地形成一些抽象和精确的命题以及从这些命题中推论出经验规则。其次,在政治学研究中要做到完全价值中立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政治事实中本来就掺杂着价值问题,事实与价值无法截然分开。针对行为主义的“矫枉过正”,后行为主义主张既要注重事实分析,又要注重价值分析。“理所当然……必须对‘事实’予以关注……但同时也要关注价值方面。各种价值(包括道德价值)在政治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价值包含在事实之中……忽视价值意味着忽视政治学的一个极

为重要的方面。”新近的发展趋势表明,一个旨在整合这两种方法论的努力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所认同。

3.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分析方法,它们有各自的优点和缺陷,但二者并不必然彼此排斥。政治学研究本身的特征也需要将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相结合。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都应有它们正确和合理的地位,二者互为补充。有如大卫·克里尔(David Collier)在《政治学新手册》一书中所说:“通过良好的交流,对少量案例进行定性比较的专家和学者能够推动定量比较学者朝向更精细的结构分析方向发展。同样地,定量比较的研究者也能推动定性比较的专家和学者朝向更为系统的测量和假说验证的方向发展。”

注释:

彭怀恩:《政治学的世界》,台湾:风云论坛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 页。

[美] 杰克·普拉诺:《政治学分析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5 页。

Jarol B. Manheim, Richard C. Rich, *Empirical Political Analysis: Research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Third edition), Longman Publishing Group, 1991, p. 6.

Robert E. Goodin, Hans-Dieter Klingemann,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Robert E. Goodin, Hans-Dieter Klingemann,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751.

Rod Hague, Martin Harrop, Shaun Breslin, *Political Science: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New York, Worth Publishers, 1998, p. 272.

Jarol B. Manheim, Richard C. Rich, *Empirical Political Analysis: Research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Third edition), Longman Publishing Group, 1991, p. 6.

Robert E. Goodin, Hans-Dieter Klingemann,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782.

Vernon Van Dyke, *Introduction to Politics* (2nd edition), Chicago, Nelson-Hall Publishers, 1998, p. 5.

Robert E. Goodin, Hans-Dieter Klingemann,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765.

参考书目:

[美] 兰·艾萨克著:《政治学的视野与方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美] 奇斯克:《政治学研究方法举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美] 格林斯坦、波尔比斯:《政治学手册精选》,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俞可平:《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吕亚力:《政治学方法论》,台北:三民书局 1994 年版。

易君博:《政治理论与方法研究》,台北:三民书局 1993 年版。

Jarol B. Manheim, Richard C. Rich: *Empirical Political Analysis: Research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Third edition), Longman Publishing Group, 1991.

Robert E. Goodin, Hans-Dieter Klingemann,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Rod Hague, Martin Harrop, Shaun Breslin, *Political Science: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New York, Worth Publishers, 1998.

Vernon Van Dyke, *Introduction to Politics* (2nd edition), Chicago, Nelson-Hall Publishers, 1998.